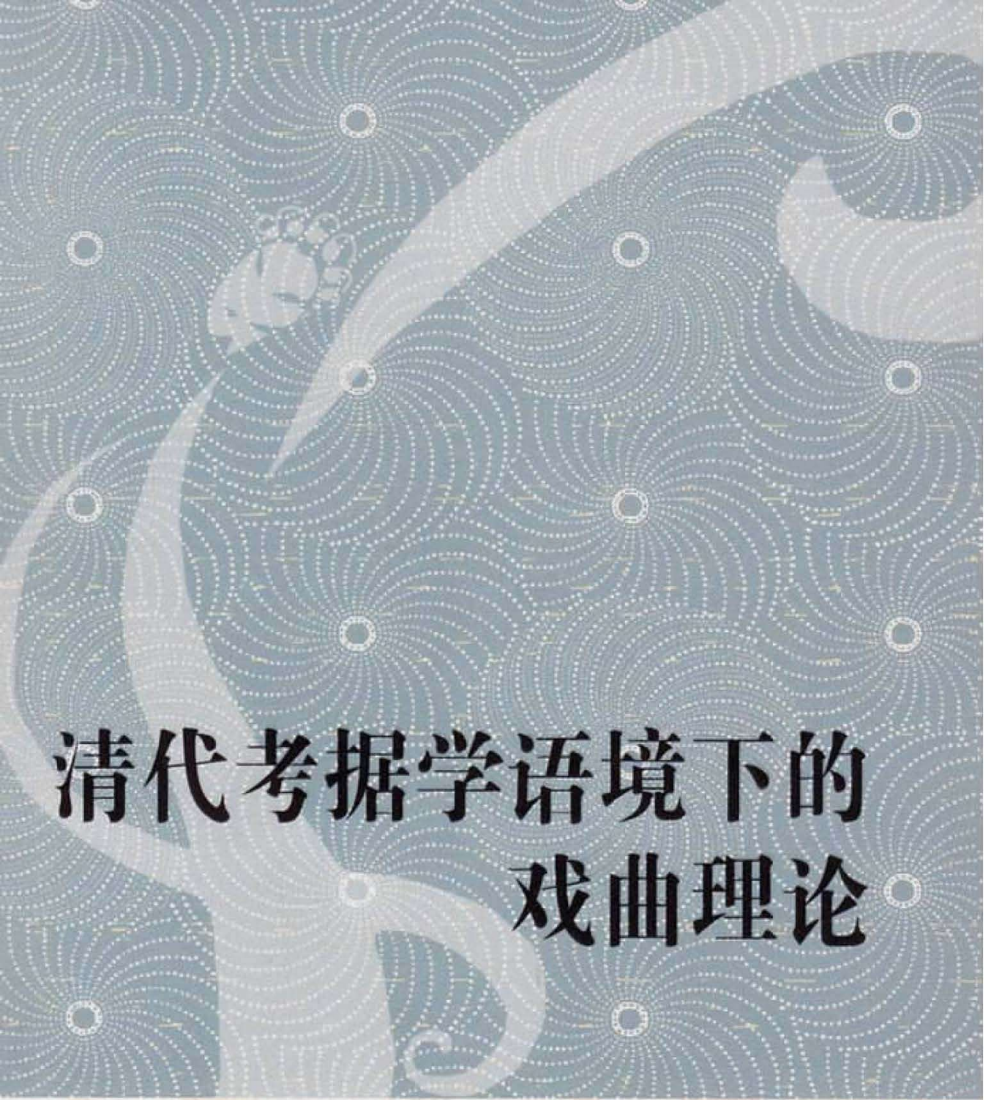




清代考据学语境下的 戏曲理论

中华戏剧史论丛书

石芳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代考据学语境下的戏曲理论 / 石芳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11

(中华戏剧史论丛书)

ISBN 978-7-5325-8620-2

I. ①清… II. ①石… III. ①古代戏曲—戏剧理论—
研究—中国—清代 IV. ①J809.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39072 号

中华戏剧史论丛书

清代考据学语境下的戏曲理论

石 芳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惠敦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6.875 插页 2 字数 394,000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300

ISBN 978-7-5325-8620-2

I·3219 定价: 6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总 序

中华戏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的历史形态从未断绝，但常变化出新，成为一种最为根深叶茂而又独具风貌的艺术门类。对中华戏剧的研究，已有许多成果面世，展示了中华戏剧在各个时代的风貌及在各有关元素、层面、领域的表现。现在是到了有必要亦有可能展开总结提高、深入开掘的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中华戏剧史”乃至“中华戏剧学”的系统学科的时候了。《中华戏剧史论丛书》的编辑出版，正是对此一时代需求的一种回应。

中华戏剧艺术涵蓄了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个时代、多个门类的艺术形式，是集诗、歌、舞、杂技、曲艺以及新出现的多种艺术样式的集合体。长期以来对中华戏剧艺术的研究，由于学业上的沿习或观念上的局限，存在着偏重案头文本而忽视场上演艺的倾向。本丛书则立足于还原戏剧艺术本来面目的“大戏剧”观念，注重作为“演出艺术”的戏剧的“立体性”研究，注重对多重艺术元素融合创新的历史总结，力求突破以往艺界与学界所习惯的戏剧研究框架和内部格局，从而拓展研究领域。

这对于建立一门完整而又科学的戏剧艺术学,其意义不言而喻。

中华戏剧既是中华民族历代创造的结果,亦是世界文化交流的结晶。本丛书自然十分注重对各民族文化及世界文化交流的历史总结。因而,我们推动的研究可为当代戏剧艺术创造实践及艺术理论创新提供历史借鉴,亦可为进一步开展民族文化交流及国际文化交流提供历史经验及现实启示。

对中国戏剧历史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且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一个世纪前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1913)。吴梅的《中国戏曲概论》(1926)及日本青木正儿的《中国近世戏曲史》(1930)紧随其后。此后较重要的著作有徐慕云的《中国戏剧史》(1938)、周贻白的《中国戏剧史长编》(1960)和《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1979)、张庚与郭汉城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1981)、董每戡的《说剧》(1983)等。这些著作的问世,为中国戏剧史的研究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特别是对基本史料的开掘、对元明清名家名作的分析、对历代重要戏剧文化现象的描述诸方面,已取得相当丰硕的成果,其贡献巨大。此后,另有一些“戏剧史”或“戏曲史”亦各有特色,如《中国演剧史》(田仲一成,1998)、《中国戏曲发展史》(廖奔、刘彦君,2000)、《插图本中国戏剧史》(叶长海、张福海,2004)、《中国戏曲通鉴》(王永宽,2008)、《中国古代戏剧形态研究》(黄天骥、康保成等主编,2009)等。

与此有关的,尚有诸多方面的研究。其一是专门的文本、资料汇编或文献、文物研究,如《宋元南戏百一录》(钱南扬,1934)、《古本戏曲丛刊》(初、二、三、四、五、九集,1954—1984)、《善本戏曲丛刊》(1—6辑,1984—1987)、《方志著录元明清曲家传略》(赵景深、张增元,1987)、《宋金元戏曲文物图论》(山西师大戏曲文物研究所编,1987)、《全元戏曲》(1—12卷,王季思主编,1990—1999)等。其二是断代史的研究,如《宋金杂剧考》(胡忌,

1957)、《唐戏弄》(任半塘,1958)、《元代杂剧艺术》(徐扶明,1981)、《明清传奇史》(郭英德,1999)、《中国近代戏曲史》(贾志刚主编,2011)等。其三是剧种史的研究,如《昆剧演出史稿》(陆萼庭,1980)、《秦腔史稿》(焦文彬,1981)、《中国京剧史》(上、中、下,集体编著,1990—2000)、《中国藏戏史》(刘志群,2009)等。其四是对相关领域的研究,如《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潘光旦,1941)、《古剧说汇》(冯沅君,1947)、《说俗文学》(曾永义,1978)、《傩戏、少数民族戏剧及其他》(曲六乙,1990)、《戏曲美学》(陈多,2001)等。其五是对戏剧综合体中各艺术元素的研究,如《中国剧之组织》(齐如山,1928)、《戏剧表演论集》(阿甲,1962)、《昆曲格律》(王守泰,1982)、《戏曲舞台美术概论》(栾冠桦,1993)、《戏曲音乐概论》(武俊达,1993)、《戏曲优伶史》(孙崇涛、徐宏图,1995)等。此外,对有关中国戏剧史的一些专题(如中国戏剧的起源、中国传统戏曲的前途与命运)的讨论,对历代戏剧名家名作的研究,对戏剧理论史的研究,对各地方戏曲剧种的调查研究,对表演艺术家的评传等,亦时出佳绩。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近年来《中国戏曲志》编委会在全国全面展开调查研究,十余年间出全30卷。这对于我们全面了解全国各地、各民族的戏剧历史及现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极大的便利。近年还出版了许多规模较大的工具书,如《中国曲学大辞典》《古本戏曲剧目提要》《中国昆剧大辞典》等,对于了解戏剧学的艺术门径及前人的研究成果,从而继续深入展开研究也都大有帮助。

以前的所有研究成果,为我们“新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使今后的研究比以往的研究有更高的基础。在展开新的戏剧研究的时候,对于前人的研究成果,我们将十分注意学习、提炼,吸收其学术精华,而对于前人认识上的一些局限,则尽可能

予以克服。

这里即以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为例。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开启了戏曲研究的一代风气,并形成有关中国戏曲史的一些主流观点。这些观点传播广远,影响深刻,其学术价值与理论意义不可低估。但由于时代的前进和学术的发展,一些概念的涵义因时而变,某些主流观点亦不时受到挑战。这里试举数例,略予阐说。

一、关于“戏剧”与“戏曲”的概念。已知“戏剧”一词始于唐代,“戏曲”一词始于宋代,但开始出现时的含义与今天大不相同,此后其义亦常有各种变化。王国维笔下的“戏剧”主要指演出艺术,“戏曲”主要指剧本文学,故称无剧本的为“上古至五代之戏剧”,称有剧本的为“宋元戏曲”,并认为“真戏剧必与戏曲相表里”。时至当代,我们所称“戏剧”或“戏曲”都是指演出艺术,不过,通常以“戏剧”为全称(包括戏曲、话剧、歌剧、木偶剧等等),而以“戏曲”为特称(特指中国传统的“以歌舞演故事”的戏剧)。本丛书的“戏剧”即是一个全称。

二、关于中国戏剧的起源与形成。以往主流派意见认为中国戏剧起源于上古而形成于宋元。这一派观点细分之又有形成于两宋、宋金、金元等之别。近数十年来有不少学者对此说提出异见,遂有形成于先秦、汉代、北齐至唐代诸说。“先秦说”又有两派,其一证之以古优如“优孟衣冠”,其二证之以《诗经》《楚辞》。“汉代说”主要证之以《东海黄公》,称此为中国最早的戏曲剧目。“北齐至唐代说”主要证之以《踏谣娘》,称此为中国第一出略具规模的歌舞剧。

三、关于“成熟戏剧”的标志。王国维因循西方近代文学观念,主张戏剧之是否成熟,其标志在于有无剧本。而这正是中国戏剧形成于宋元一说的理论依据。但由于对“剧本”的认识有

异,于是就有了唐代是否有剧本,《诗经》、《楚辞》是否有部分剧本因素等等问题的争论;近年又有了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是不是剧本的讨论。但已有不少学者指出,有无剧本并不是戏剧是否成熟的唯一标准,不能把幕表戏体制下的中国戏曲、外国的即兴喜剧等戏剧类型排除在成熟戏剧之外。现代有些戏剧流派甚至主张剧本并不是戏剧的必要条件。有人则认为戏剧的最根本生命力在于它的“剧场性”,在于人与人的当场的“活的交流”。

四、关于“叙事体”与“代言体”。王国维认为“真戏剧”除了必须有剧本之外,其体裁则必须为“代言体”而非“叙事体”。所谓“叙事”,主要指扮演者以与角色有一定距离的叙事者身份进行表演;“代言”则主要指表演者以第一人称身份扮演或模拟节目中的人物。曲艺表演总是以叙事体为主,而以代言体为辅。至于戏剧,由于它的艺术特征即是扮演人物、表演故事,所以一般多是以“代此一人立言”的代言体方式进行表演。但中国戏曲并非只限于使用代言体表演方法。元杂剧以及后世戏曲中的“自报家门”和某些引子、上场诗、旁白、独白等,都包含有以叙事者身份介绍戏剧内容的叙事性质;曲文唱词也同样有属于叙事性质者。20世纪30年代以来,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提出“非亚里士多德”式的“史诗剧”,又称为“叙述体戏剧”。在他的戏剧中常有“歌唱者”之类人物出现,以达到他所追求的“陌生化效果”。布氏把戏剧看作是“讲一段故事”,有似于中国说唱那样的“叙述体”。此类戏剧新观念,已与西洋传统写实主义戏剧大相径庭,而与中国的“写意性”戏剧精神相通了。中外戏剧实践的新探索,戏剧观念的新突破,都为我们深入认识中国传统戏剧提供了新的视角。

本丛书十分关注当代戏剧实践中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十分关注近期来戏剧观念的变化,亦努力在研究中选取行之有效

的新视角、新方法,以期别开中国戏剧研究的生面。基于此,本丛书着重刊布近年来的最新研究成果,同时,亦着意选择前辈学者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但因故未能广为传播的、至今依然具有创新意义的学术著作,予以重版刊行。希望能于数年间形成中华戏剧史论研究的新系列。

叶长海

2012 年 10 月 16 日

序 一

清代的学术,表现出与前代不同的取向。从宋到明,程朱一派主张“道问学”,重视格物以穷其理,陆王一派主张“尊德性”,认为心统万物,清人则作出自己的抉择,举起复古的旗帜,倡导考据学。哲学家们认识世界方式的改变,导致经学思潮随之更新而获得新生命力,而学术思想与文学艺术包括戏曲的关系也悄然发生种种变化。

从宋到明清,勾栏瓦舍中兴起的戏曲越来越受到学士文人的重视。学士文人对于戏曲,原本是不屑一顾,渐渐自然而然地有所关注,而其中的有心人更自然而然地有所议论,甚至有所研究了。“五经四书,布帛菽粟也,家家皆有;高明《琵琶记》如山珍海错,贵富家不可无”(徐渭《南词叙录》引朱元璋语),“岂非以人情之大窦,为名教之至乐也哉”(汤显祖《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卜其可传与否,则在三事:曰情,曰文,曰有裨文教”(李渔《香草亭传奇序》),对于戏曲的各种评判、各种见解,议论纷纭,不一而足。人们的视野、思维方式以及研究方法,总与一定时代的学术思潮息息相关。方法论的改变、经学思潮的更替,其

影响在古代戏曲创作与研究领域一直或显或隐、或强或弱地有所反映。戏曲在主流舆论里一直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但人们在实际生活里似乎又绕不开它，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也是一个值得深入挖掘的话题。由此出发，我们有可能从另一个视角去了解诸多戏曲理论观点纷纷产生、彼此辩难的原因，认识戏曲理论历史演变的规律，以及理论对戏曲产生的正面或者负面的影响。

石芳的《清代考据学语境下的戏曲理论》一书，把清代戏曲理论置于考据学的语境下去认识，便是选择这样一种新的视角，就是从方法论的改变去探索清人如何看待戏曲并进行理论研究的历程。从“考据”这个角度去看清代的戏曲理论，我们很容易想到《传奇汇考》，李调元的《曲话》《剧话》，焦循的《剧说》《花部农谭》以及姚燮的《今乐考证》等一系列清代戏曲理论著作，它们的研究方法的改变，都是有踪迹可寻的。人们会进一步追问：这种改变发生的原因是什么？由此展开，清代学者文人从事戏曲研究的动因是什么？他们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观点具有什么时代特征？应该如何评价他们的戏曲研究成果？这就需要进行一个系统的、历史的研究，才有可能得出答案。

这样一个选题本身，决定了它的研究具有相当难度。作者必须了解主要的经学著作，了解学术思潮发展史，尤其是考据学史，同时，不光要考虑清代，还要往前追溯理学思潮和心学思潮语境下的明代戏曲理论，如此才能理出清晰的历史线索，得出比较可靠的结论。这就要求作者必须有足够的文献阅读量和比较准确的识断能力。应当说，本书作者经过长期努力，在这两方面都作了相当充分的准备，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取得了可观的成果。全书纵横交织，点面结合，以缜密的结构和深入的论述，系统地梳理了清代戏曲理论的发展历史。纵向来

看,注重考据学的历史变化给戏曲理论带来的微妙差异,注重分析明清二代之历史区别;横向来看,关注理论的主要变化,列举了各个时期的主要代表,做到了点面结合,既不失之浮泛,又不陷于片面。

从石芳身上,我们能够发现年轻学者的一股锐气,她有旺盛的求知欲,富于探索精神,在导师的指导下,根据自己的独特思路,作出了一些新的有益的探讨。诸如清代“曲史”观和曲学考证、戏曲叙事“虚实论”关系,清代戏曲功能观、音韵理论这些话题,人们可能并不陌生,但置于考据学语境之下,重新加以审视,便发掘出了新的蕴含,使读者感觉颇有新意。就具体学者的研究而言,大致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人们比较熟悉的戏曲理论家,如焦循,其《剧说》《花部农谭》的考据特色不是一个新的话题,但作者却能够深入挖掘作为经学家的焦循,其戏曲理论观点与易学思想之间的关联,这就使我们对于焦循戏曲理论的特色,不仅知其然,而且进一步知其所以然,这就将对焦循戏曲理论的研究推进了一步。第二种情况是还有一些原来不太被关注的戏曲理论家,如毛奇龄、毛先舒、平步青等人,本书也都给予了关注,从他们的各种著述中找出有关戏曲的见解,并进行分类总结,由此细致地分析他们的戏曲理论观点,对他们在清代戏曲理论发展中的贡献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这样在扎实的文献基础上所作的思考与论析,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也拓宽了清代戏曲理论研究的范围。

《清代考据学语境下的戏曲理论》一书,正是这样注重从文献的细致比较与分析中得出结论。其第二章通过明清二代有关文献的分析比较,从“以曲为经”“以曲为史”“以礼代理”三个方面去分析清代戏曲理论的时代变化,使读者能够大致了解明代经学思潮与戏曲理论之关联,也能深入理解两个时代戏曲理论

之差异。作者通过文献分析明清学者关于戏曲社会教育功能主张的变化,将理学家、心学家、考据学家的主张分别概括为“理教”“情教”“礼教”,其中的微妙差异,便以比较直观的方式揭示出来,然后加以阐述,启发读者的深入思考。

总之,石芳的《清代考据学语境下的戏曲理论》使人耳目一新,它以一种独特的探索模式,将有清三百年的学术语境下的戏曲理论史清晰系统地呈现出来。这种“呈现”,包含多个层面,我觉得作者本人概括得很好:“清儒因为反对宋明理学以‘六经注我’的说经方式而在治学时倾向于使用考据方法,当这一方法流行开来,清代学术主流便因其治学特色而被称为清代考据学。我们使用这一概念,不仅关注考据学之学术特征,更强调其作为特定时代的学术思潮的特色。在这一学术思潮语境中持续演变的清代戏曲理论,其变化不仅体现在著述的体例、方法、内容层面,更体现在学术观点、研究倾向、著述品格、思想倾向层面。”这种多层面的发明,体现了作者的学术眼光,能够对清代戏曲理论研究作出切实的有深度的推进,其创新价值无疑是应当肯定的。

本书是石芳博士论文的改订稿。我认识石芳,也正缘于她的博士论文答辩。她的论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答辩会上,与会专家对于她的论文一致给予好评,认为论文考、论并重,行文逻辑清楚,语言准确流畅,文献涉猎广泛丰富,运用也恰当准确,显示出良好的学术素养。她对答辩委员提问的回答,也能胸有成竹,要言不烦,证明是确有研究,别有会心。当然,由于这一课题涵盖面相当广,涉及的问题比较复杂,石芳已经进行的研究还不能说十分齐备,十分完美,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有些问题的研究还只能说刚刚开始。令人欣慰的是,在与石芳的交流中,我日益发现她是一个能够沉住气的年轻学人,孜孜向学,坐得住冷板凳。“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新人辈出,

正是学术事业永葆活力、不断发展的希望所在,令人从内心感觉欣喜。在上海戏剧学院攻博期间,石芳在叶长海教授等前辈学者的熏陶和导师杨剑明教授的具体指导下,研究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现在,她在上海大学跟随蓝凡教授进行博士后的课题研究,希望她能够秉持本心,继续努力,争取在学术领域有更多新的创获。

赵山林

序 二

石芳的《清代考据学语境下的戏曲理论》一书即将正式出版。这是一本从非常特殊的角度对清代戏曲学术活动进行探讨的书。

自元代以降,随着戏曲——我们今天将之统一的一种称呼——的兴盛,古代文人对戏曲的关注度也随之增强。至明清两代,今天可以称为戏曲论著的书籍数量已经是非常可观了。尤其是有清一代,加上各种笔记小说中对戏曲讨论的“笔记”式论述,戏曲理论的丰富程度可以说是蔚为大观了。

虽然中国文学史上一直讲诗、词、曲,但对于“曲”,即戏曲的讨论毕竟不如对诗词的讨论。

有清一代的学术是以“考据”为主的时代,从考据的途径来探究一下清代文人的戏曲学术活动,本身就饶有兴味。

从这一思路追寻下去,有清一代对戏曲的“考据”之学,不管怎么说,把戏曲当作一个研究对象,使之登上大雅之堂,将其与诗、词同等对待了。虽然,这样的学问是上不了“科举”之路的,但毕竟对中国戏曲的保存和流传,有着十分重要的功劳。

古代文人品评戏曲作品或戏曲演出,探讨戏曲的源头、衍变和发展,态度各异,原因也各异,当然方法也就“各领风骚”。

非常有趣的是,作为乾嘉学派的“考据”之风,很容易转为我们今天所定义的“文献学”的途径和方法,学术的兴趣放在了典籍的校订,版本的鉴别,对内容得失的品评和目录的编制上。其中,对戏曲剧目名称与内容的流变的考证与论述,在清代达到了鼎盛。它的边界也触及到了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训诂学、音韵学和文字学等各个方面。

当然,这与后来民国时期引入中国的现代文献学是不尽相同的。

从“考据学”的视角来看待清人的戏曲学术活动,可以非常清楚清代在戏曲学术活动上的两个非常独特的“清式”特征:一是对戏曲“研究”的“案头”和“场上”的分别,可谓泾渭分明,可见,有清一代,伴随“考据”之风兴盛的同时,戏曲学术活动自身也已经慢慢溢出文人的圈子而流向民间;二是进入考据途径的戏曲学术活动,至清代达到中国古代的集大成阶段,也就是达到它的“巅峰”。而“巅峰”隐含的另一层意思,即事物的发展走到它的尽头,转折也就在前头。

焦循的《易余曲录》与《花部农谭》便是个明证,“案头”和“场上”可以如此附于一身,今天看来都觉奇妙。而且,至晚清,《粉墨丛谈》之类的书籍大批量产生,更是将戏曲的“学术”导向了舞台风月场上。

姚燮的《今乐考证》是另一个代表。

对于姚燮的《今乐考证》及其治学态度,功过异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姚燮将宋金杂剧院本、元明清杂剧、传奇、花部当作“今乐”,以与“古乐”相对应,又将诸宫调、散曲、俗曲当作“今乐府”,以与“古乐府”相对应,便是一件很好玩的事。“乐”是中国

古代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艺术形态，姚燮对“乐”的这种态度与认识的“变换”，至少表明在戏曲领域，至这么一部资料性集大成的著述问世后，有清一代的“考据”之风也就到此快终结了。

《今乐考证》大概就是这种“考据”方式的历史最后一步。

王国维是横跨两个时代的人——从晚清到民国，所以，王国维的戏曲研究自然也带有跨界性——从浸润文献考据到接受外来文化。这种转变，给了王国维戏曲理论新的眼界和方法。他对戏曲概念的定义——“以歌舞演故事”，就是在吸取外来文化基础上的一次跨界性的“考据”结果。

自然，这种跨界性的结果，在今天看来，不仅争议颇大，而且更可以说，完全可以“推倒重来”而新话新说的。

这当然是后话。

拉拉扯扯说了这些，无非想说，从考据学角度重审清代戏曲学术活动的重要性，以及本书出版的必要性。

是为序。

蓝 凡

2017年9月24日，

是日小雨，是个天凉好个秋的思絮时节

目 录

总 序	叶长海	1
序 一	赵山林	1
序 二	蓝 凡	1
绪 论		1
第一章 清代戏曲理论与考据学渊源		13
第一节 清代考据学概说		20
一、清代考据学及其学术特征		20
二、义理与经世		27
第二节 清代考据学渗入戏曲理论的历史原委与 现实缘由		32
一、历史原委		32
二、现实缘由		42
第三节 考据的运用与戏曲理论之历史演变		55
一、明代以前相关戏曲类考据		55